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政治学系列 •

总主编 华世平

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

[英] 哈罗德·J·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著

[美] 约翰·L·斯坦利 (John L. Stanley) 新序

林 冈 郑忠义 译

欧阳景根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

[英] 哈罗德·J·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著

[美] 约翰·L·斯坦利 (John L. Stanley) 新序

林 冈 郑忠义 译

欧阳景根 校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出版说明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西方，有关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阐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产生了十分丰富和系统的政治学思想，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学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是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步并不算晚。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政治学课程开始在国内少数大学中讲授，如果从 1905 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只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短二十几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一度中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按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学术专著，引进了一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应当说，政治学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

发展中的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当然，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其学术观点、理论预设等也不完全为我们所认同，但对处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政治学来说，以开放的思想对待西方的理论，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创新，不失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条捷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诚协作，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出版这套译丛，旨在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学术著作系统地译介给中国读者，为国内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总的来看，这套译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威性。所选著作均为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得到国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在西方主流学界被反复引用。丛书作者包括罗伯特·A·达尔、塞缪尔·P·亨廷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安东尼·吉登斯、伊恩·夏皮罗、约瑟夫·S·奈、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个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套译丛强大的作者阵容。

第二，全面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一些政治学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但这种翻译出版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零散的。本套译丛是国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它试图涵盖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比较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思潮、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

第三，前沿性。本套译丛选择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后行为主义、全球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等的著作，以期促使国内政治学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较为及时地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套译丛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并邀请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教授担任译丛总主编，他对部分原著的推荐、译者的选择以及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十分感激！参与本套译丛翻译工作的译者大多是本领域的学术骨干和中青年专家，都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政治学系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校工作还存在些许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导 读



哈罗德·拉斯基的职业生涯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倾一生的精力写了至少 14 部著作，但很多作品都没有再版。本书是拉斯基满怀兴奋和激情论述自由主义兴起的著作，它也是在政治理论的推荐书目中少见的拉斯基的作品之一。然而，对于上一代人来讲，这本书也只有在大学图书馆里才能见到。

拉斯基名望下降的原因是他战后社会中所坚持的左翼立场。战后政治的温和与保守主义同拉斯基写本书时所处的激进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 19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分子也都轻视拉斯基的作品所凭借的历史视野。拉斯基作为在政治理论中运用历史方法的倡导者，其名望受益于这种方法所阐述的道理，但也因此受累。

拉斯基第一本杰出的著作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宗教思想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倾向，就好像这些思想具有持续的相关性。但是，随着拉斯基日益被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吸引，他越发坚定地相信，这一历史方法可以证明，政治思想，包括反国家主义，都无法超越产生它们的环境。随着拉斯基的学术思想与他自身日益明显的国家主义（statism）的政治主张相结合，他也变得广受欢迎，因为当时国家主义的观点已经



成为那一时代的法则。但伴随着国家主义的衰落，他后来所付出的努力也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此时，他既忽视了超越历史的反国家中心主义（anti-centralism）的可能性，也忽略了自己思想中所体现的历史主义的真理。

尽管拉斯基日益相信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但他仍然被先前的残余观点困扰着，认为思想可以超越它们所处的时代而延续下去。没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好地表现出暂存性和永久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能够看到，这本著作中所描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原则仍然同我们如影相随，而对这些原则，拉斯基也深表赞同。但是拉斯基的描述却同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背景相矛盾，因为后者认为自由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紧密相关，而这种结构注定要消失。事实上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信仰是持久存在的，而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则预言自由主义将会消失，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使本书更加富有戏剧性。此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拉斯基的历史观念甚至强化了政治思想中的历史传统，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今天依然广泛流行。

从众多对拉斯基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所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长期对某些自由主义原则的坚持，例如艾萨克·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k）和巴里·希尔曼（Barry Sheerman）以卓越的才华对拉斯基进行了描述。^[1]通过这些描述我们了解到，拉斯基是一颗流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一举成为了政治和学术上的风云人物。他写了很多部著作和几千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常常还只是未经修改的草稿，但却列举了所参考的文献来源，这都源于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及同样令人惊讶的学识。作为一名教师，他也毫不逊色。他的演讲总是座无虚席，并且，他从前的学生在谈及他的演讲的时候，也依然兴致勃勃。他能记住学生的名字，而且，他也广泛地影响了一大批未来的学者和世界领袖人物，包括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印度后来的外交部长梅农（J. Krishna Menon）。就算是在餐桌上或讲故事的时候，他也同样引人注目，光芒四射。拉斯基非常喜爱讲述朋友的故事，而有些故事显然是他编造出来的，或者是极度夸张

的。不管怎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他已经在三大洲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2]然而，1950 年他逝世时年仅 57 岁，此后他的大部分政治著作也逐渐地被人遗忘了。

1893 年 6 月拉斯基出生在曼彻斯特一个颇具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家庭。这个体质虚弱、经常因病卧床不起的男孩在书中找到了慰藉。自从他的父亲内森·拉斯基（Nathan Laski）（曼彻斯特犹太人的无冕之王）积极投身于自由主义政治活动以后，年轻的拉斯基就开始受到政治活动的熏陶。他对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之一就是看到年轻的、崇尚自由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拉斯基父亲的家里面对镜子练习演讲。在牛津大学，正如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所说的“拉斯基的好斗和自信的个性”，使得他这个语言学校的局外人也可以在牛津工会（Oxford Union）的辩论中显得格外出众。

不过，在辩论方面的成功并未阻止拉斯基被吸引到较少运用言辞的政治活动当中。他不仅被女权主义所吸引（在工会的辩论中人们认为他已经同女权主义紧密相连），而且接受了工团主义（syndicalist）及其所倡导的直接行动理念。事实上，直到 1920 年，他仍然同情工团主义者所提出的反国家主义的立场。^[3]在 1914 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拉斯基成为了《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反战社论撰稿人。尽管如此，他也试图应征入伍，但因为心脏虚弱而遭到拒绝。也许，他早已预料到最终自己会因身体虚弱而被拒绝，因此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遗憾。拉斯基随即和他的妻子弗里达（Frida）乘船到蒙特利尔（Montreal），成为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历史讲师。

正是在麦吉尔大学，拉斯基结识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后者成为拉斯基的终生挚友，即使拉斯基在 20 世纪 30 年代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通过法兰克福特的关系，拉斯基得以进入哈佛。在哈佛，他令其学生和同事们刮目相看，并开始在美国政治集团的众多新秀中建立了一个由其广大仰慕者构成的崇拜网络，其中包括庞德（Pound）、布兰代斯（Brandeis）以及同拉斯基交往甚密的《新共和国》（*New Republic*）的编辑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



ly)。后来，他又结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和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当然还有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正是霍姆斯同拉斯基通信交流的观点，成为日后拉斯基作品中最具持久影响力的部分。^[4]

尽管拉斯基同国家主义论者克罗利建立了朋友关系，但这位年轻的哈佛大学讲师仍然是一个反中央集权者。这可以在拉斯基的第一批著作《主权问题研究》（*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和《现代国家的权威》（*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中体现出来。这两本书分别在1917年和191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集中论述了维多利亚宗教论战中反国家主义的因素，而后一本书则研究法国天主教反动行为的政治理论。这两本书的目的，如其所言，都力图阐述这样一个观念，即绝对的主权是一种幻想，因为几乎所有追求统一的社会秩序都必须依赖于多数人的同意。“国家”（即拉斯基所指的中央政治权威）的倡导者们，不管他们是古代的、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哪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对国家决定进行的有组织的反抗，不是根植于人们真实感受到的深切不满，在1381年时这样……在1789年也是如此”^[5]。

毫无疑问这些记述都是基于史实的，而且拉斯基还明确地预言，现代主权学说将同国王神圣权力的教义一样，最终必定会消失。但是，这些消失是基于其他的先验原则，这些原则是由讲求实效的多元主义术语（一般认为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表达出来的，它们不认为部分只能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被定义出来：国家“只是社会团体之一，而一个人的个性吸引他加入社会团体”。

这两本拉斯基的早期著作都坚定地言论自由和个体反对国家权威的表达自由等自由主义原则辩护。他支持波士顿的警察罢工，批判1919年的“红色恐怖”，并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争论狂潮，其第二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尽管当时拉斯基广受欢迎，但也由于他在这问题上的立场而树敌无数，而且这一点也并没有因他经常会为自己的

自负深感内疚而得到任何弥补。拉斯基倾向于夸大他的朋友圈，几乎丝毫不能缓解他的自负形象。^[6]然而，如果考虑到他给世人留下的这些非常真实的印象，那么，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使一些熟人与他渐渐疏远，当然就不是十分令人诧异的事情了。当1920年拉斯基回到英国的时候，他的政见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监事会（Board of Overseers）中引起了震动，此时，他已经出版了三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和很多篇评论文章，那时他才27岁。^[7]

同拉斯基交往的大多数朋友都是非常真诚的，友情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8]最初拉斯基名义上与自由党人站在一起，他的家庭支持这一政党，但他对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的机会主义越来越反感，并且随着他同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快他就从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转向了费边主义和工党。到1921年，拉斯基已经专心致力于费边委员会的工作，不辞辛劳地制作费边主义的宣传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1923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篇论文》（*Karl Marx: An Essay*）。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作品，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在工人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英国各地的工人团体中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并帮助霍尔丹（Haldane）建立了英国成人教育学院（British Institute for Adult Education）。这所学校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根据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的分析，87%的英国工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接受了英国成人教育学院某种形式的教育。^[9]

工党的政治主张在拉斯基的下一部作品《政治典范》（*A Grammar of Politics*, 1925）中得到了更加直接的展现。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国家描述成一种控制资本主义力量和实现机会平等的积极手段。虽然他仍认为决策应由工厂中的工人队伍来完成，但他将福利国家和某些产业的国有化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此外，拉斯基继续为反对国家权力的言论自由和道德良心进行辩护，再一次反对“红色恐怖”的形势



和对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的迫害——这一次是在英国。

在1926年大罢工之后，拉斯基出任工业法庭（Industrial Court）的仲裁人，并终其后半生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工业法庭是一个为了解决工业争端而建立起来的机构。拉斯基还写了深受欢迎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一书，高调批判共产主义者中的宗派主义，并且规劝人们不要同他们站在一起。这本书广受赞扬（当然，共产主义者除外），并且巩固了他同工党上层已经建立的广泛联系。拉斯基已经多次被要求代表工党，作为该党的议员候选人。虽然他总是拒绝，但在1929年大选期间，他在三十余个选区参与工党候选人竞选活动，并为工党赢得了权力。次年，他成了重获生机的《每日先驱报》广受欢迎的每周专栏作者。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一天卖出两百万份的报纸。^[10]

在这一时期，拉斯基与工党的左派逐渐趋同——并且第一次跟工党领导层形成对比，因为在拉斯基看来，他们大都缺乏政治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对自由表达的坚定辩护。在1930年出版的《现代国家中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一书中，拉斯基重申了这种思想。然而，1931年9月麦克唐纳的背叛（Great MacDonald Betrayal）瓦解了工党政府，并建立了依然由麦克唐纳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这之后，拉斯基更加坚定地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粉红色十年”（pink decade）期间，即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称之为“拉斯基时代”期间，拉斯基成为英国和美国左派的主要代言人。^[11]拉斯基对已经被地方党部开除出党的麦克唐纳发动的攻击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他认为麦克唐纳的“背叛”与乔治五世违宪操控事件的“宫廷政变”可以等同，这一背叛使拉斯基坚信，在资产阶级处于危难的时候，它将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违宪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12]

但是，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工党又该如何应对共产主义者对议会政治的奚落，而为自己辩护呢？拉斯基对这种两难困境所做的回应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双重忠诚，这一回应使他更深地卷入工党政治。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拉斯基所期望的是，“试图巧

妙地通过议会手段，制止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动议会外的蓄意破坏活动”^[13]。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很难达到平衡的事情。他希望发生在1931年的灾难性事件能够使工党清除内部的中间派和自由派分子，为此他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一道成立了社会主义者联盟，宣称它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所有成员均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党。

1933年，拉斯基出版了《危机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Crisis*）一书。尽管这是他到那时为止最具“中央集权主义”（centralist）色彩的一本书——排斥多元主义、联邦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但仍然体现出拉斯基的内心深处所秉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相互冲突。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统治者不会坐视不管（本书不断重申这一主题），甚至还建议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府可以诉诸紧急权力或者实施宪法专政（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另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将会赞同和平革命，并且，他还坚定地支持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

工党内部对前一个观点的强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党内的温和派开始动员，抵消他们所认为的拉斯基给工党带来的窘境，因为工党的纲领仍然是凯恩斯主义和温和主义。尽管拉斯基受到工党内部各阶层的欢迎，但他还必须赢得足够的支持，以便在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里（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谋得一个职位。1935年，拉斯基写了《国家的理论与实践》（*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在书中他公开采取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为第一个敢如此行事的英国重要学者，这也表明拉斯基在工党内部正趋于边缘化。^[14]他再一次声明自己对公民自由的坚定信念，并主张英国的统治阶级应该倾听理性的声音和坚持英国的传统。但他也再一次坚称，阶级斗争仍旧主宰着公共生活，只不过现在完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这一观点的。

一年以后，即1936年，拉斯基试图在理论层面处理先前一直困扰他的左派论述的两难困境，即阐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



考察，从最初清教徒思想中的萌芽，一直到它对 20 世纪 30 年代“粉红色十年”的重大意义。然而，尽管本书以其广阔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令人惊奇，它的副标题“一篇解释性的论文”（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倒也非常贴切。它既不是一部教科书，也不是一部不容置疑的作品。事实上，此书对于英语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标准诠释，而拉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也将这一观点戏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政治理论。

拉斯基在本书中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商业文明中的私有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一场取消财产规则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推翻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拉斯基以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宣称，自由主义在为财产辩护的过程中也包含了“自我摧毁的条件”。^[15]拉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经常同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相矛盾的趋向，一种进步的或主张采取社会行动的趋向，它将会通过规范财产，以强化自由的其他价值。但他也认为，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还没有激进到令自己的意识形态同对财产的规制保持一致。自由主义这种进步的或“社会化”的一面注定会遭到失败，因为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的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的一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拉斯基还预言，这种情形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拉斯基依然支持自由主义及其所派生的民主制度，尽管自由主义注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大潮席卷下灰飞烟灭。事实上，本书虽然简短，但提供了关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行动面向的许多丰富案例，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拉斯基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削弱了他自己有关自由主义终将失败的论点。因此，尽管本书体现了他的才华，但它依然延续了拉斯基思想的暧昧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拉斯基无法在本书的四个章节中理清这些为数众多的模棱两可的思想，这就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途径出现了四个相互交织的方法论

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途径，就像第一章中列出的那样，在强调人类思想依赖于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同时，也贬低（即使并没有抹杀）了前者的独立性，而且，它还强调物质性的历史力量对思想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是强调思想和具体行动的相互影响。第一，如果从这个一般基础出发，拉斯基可以继续宣称自由主义“就像所有社会哲学一样……无法超越产生它的〔历史〕载体”，那他又怎么能够赋予自由主义具有超越历史的特征，并赞同自由主义思想的永久贡献呢？^[16]

第二，正如拉斯基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当 17 世纪自由主义“诞生”的时候，它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流派是洛克式的，如果洛克主义是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我们怎样解释拉斯基所论述的自由主义的激进表现方式？后者是由早于洛克的平等派提出来的，并由受到洛克影响的改良家进一步阐发的。

第三，在第三章中，拉斯基对自由主义的一场政治胜利进行了描述，它消极地抵御了 18 世纪“左派分子”或者社会潮流对财产权的攻击。作为一种抗议的表达方式，或者作为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这种社会潮流依然具有活力。但是，如此一来，对这一点他的认识是不是过于不足？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将政治理论的命运同应用这些理论的政党的命运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拉斯基在结论篇中总结道，社会革命必须由自由主义以外的理论建构所激起，因为社会行动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是不相容的。但从当前或我们所知道的情形来看，他的这一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拉斯基是不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即高估了为自由主义准备了原始基础的环境的持久影响力？还是他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历史环境？或是他曲解了自由主义学说本身？还是他在这些事情上都搞错了？

尽管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可能存在上述不足，但拉斯基在书中所展现出的丰富知识，以及书中提供的大量信息，肯定使本书超出了“红色十年”（red decade）的应时之作（livre de circonstance）所具有的意义。此外，拉斯基在书中所提出的四个相关问题，精确地呈现了本书的宝贵和永恒的特性。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



天仍是学者们辩论的内容）比他所提供的答案更加重要。现在我们就转入考察第一个问题，即一般思想的永恒特性问题。

—

拉斯基在作为导言的第一章中为自由主义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即自由主义就是提倡世俗主义，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思想和质询的自由。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因素，可以按照“尽管不是普遍如此，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模式加以适用，而且，拉斯基也全心全意地拥护这种适用模式。但他继续说道，因为它“总是服务于”有产者的“目标”，自由主义“总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行动……总是乐于保护个人创新，而不是赞许政治权力所追求的社会一致性”，“总是倾向于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提出反论”。这些都是拉斯基谴责的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消极特征。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拉斯基承认自由主义具有社会行动的一面，这一社会行动的方面是因应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的。这里，他在谈论自由主义“总是”消极地对待社会行动时，赋予了自由主义一种超越历史的特征，而这同他所强调的思想的历史性是相互矛盾的。但当他将反对社会行动归为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之后，他似乎又急切地宣称，自己热烈支持的宽容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普遍性”。

拉斯基坚称，自由主义的历史不是一部“有意识地不懈追求”好的自由主义目标的历史。相反，他认为，这些好的目标都是在非故意和无意识下产生的副产品，它们服务于保护私有财产这一有意追求的目标。因此，当自由主义提出超越其最初狭窄财产范围的有意识的普遍性主张时，它根本无法获得成功，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已经多少给这些主张形成了致命的约束。

拉斯基没有回答以下这一可能，即自由主义者有意识地关注所有的目标，而且这种意识已经超出了自己最初所能企及的范围。拉斯基似乎

想要说的是，自由主义最初的意识形态面向，即对财产的保护，可以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因为自由主义的这一面向，已经在历史上成为现实。而自由主义很少意识到的另一个方面，即普遍论者对自由的辩护，是其无法实现的或“乌托邦”的面向。当然，像拉斯基这样的公民自由主义者不会仅仅因为普遍论者对自由的辩护无法实现，而质疑为自由辩护的正当性或呼吁。他所必须展示的是，普遍论者在狭义上（in particular）对自由主义的要求和在广义上（in general）对思想观念的要求所具有的历史影响要比这些要求背后的物质利益来得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出色地解释了清教职业伦理的形成同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而拉斯基正是通过批判韦伯的这一解释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

根据拉斯基的观点，清教主义帮助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是一个无意促成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他认为韦伯就坚持这种观点）。因此，韦伯和他的门徒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时代性错误：他们构建了一套资本主义的职业伦理，并将其追溯到宗教神学，而如果将这种神学置于实际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话，它与“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法规学者的观点完全一致”。尤其是韦伯认为，加尔文派所倡导的“神召”（calling）观念为职业伦理注入了力量，而这种观念在产生之初就与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思想差异不大。按照拉斯基的话来说，清教主义独特的“神召”思想在“在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之久。“到那时为止，资本主义精神对天主教徒的态度产生了根本影响，至少就跟它对清教徒的态度产生的影响一样。”（确实，即使清教徒也“不是出卖物质财富的人”。）

这样一来，清教主义与其说是一股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力量，还不如说，它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巨变同时发生，并且在特定程度上，也是由这种经济巨变所造成。只是在这之后，才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开始将失败与缺乏体面等同起来。个人利益构成了公共利益，这种观念直到后来才渗透到清教主义的思想当中。但是，如果拉斯基能够认为清教主义到后来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也就是说，清教主义可以根据历史上新形



成的阶级利益来适应新的环境，并改变自身教义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思想就不能显示出类似的延续力量（staying power），并被那些最初并未信奉这种思想的阶级所接受呢？不管怎样，将一个狭窄的阶级基础归因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拉斯基这样做是否得当？

二

在第二章中，拉斯基阐述了 17 世纪自由主义的具体发展。根据他的描述，在自由主义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带有资产阶级和财产导向，主张个人主义，相信有限国家；另一种则带有激进、实验性、乌托邦、普遍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并不“总是”敌视社会行动。尽管拉斯基在本章中比在第一章中更加大张旗鼓地描述了激进倾向，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激进倾向始终“处于主流之外”，因此它已经超出了洛克的思想范围。拉斯基恰当地认为，洛克已经为“下两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勾画出了基本轮廓”。“左派”或者是社会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在政治上已经落败于洛克谨慎的保护财产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历史根基已经牢固地扎根于那个时代之中。

拉斯基认为，既然洛克学说的最初目的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这就和《政府论》（下篇）出版之前长达数代人之际的革命时期中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思想潮流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拉斯基希望将洛克从英国平等派（Levellers）的左翼阵营中分离出来。这些左翼人士在失败的社会革命中提出了更加广泛和平等的要求。英国的平等派普遍建议，应由一个积极的国家救助穷人，这“暗示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这是一种更加适合 19 世纪而不是 17 世纪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反，洛克更好地代表了拉斯基所谓的当时人们的“心境”：“理性主义、信仰自由、宪制政府、保守中庸”。洛克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辩护，以及他提出建立有限政府以保护这些权利的理论，还有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人类观和